

蘇丹赤色政變及其影響

石樂三

在七月當中不過十天功夫，北非地區就有兩個阿拉伯國家曾經發生軍事流血政變，一個是在摩洛哥、僅僅九小時，叛軍即被敉平；另一個是在蘇丹，經過七十四小時之後，政府軍始將叛軍平服。蘇丹政變因為有共黨的背景，所以稱之為「赤色政變」。

一 短命的赤色政變

七月十九日，蘇丹突然發生一次軍事政變，一度曾推翻蘇丹政權，並將總統努邁瑞拘禁。

領導這次政變的是蘇丹自由軍官阿塔少校(Major Hashim al Atta)。在奪取政權之後，一個七人新革命指揮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RCC) 遂於二十日正式成立，主席推由諾爾中校(Lt—Col. Babekr al Nour Osman) 擔任，阿塔少校自任為副主席，兼任三軍總司令。其他委員有哈瑪達拉少校(Major Farouk Osman Hamadallah)，黎赫中校(Lt-Col. Ahmed al Rih Sheikh)，歐斯曼少校(Major Mohamed Mahjoub Osman) (蘇丹共黨首領馬佐布胞弟)，紀恩少校(Major Mohammed al Zein) 及阿布達海上尉(Captain Moawiyah Abdel Hai)等五人。

新政權的主角顯然是阿塔、諾爾及哈瑪達拉三人，他們都會任前蘇丹革命指揮委員會委員，去(一九七〇)年因有共黨嫌疑曾被努邁瑞總統革除職務，諾爾及哈瑪達拉二人曾被放逐倫敦，僅阿塔一人仍留在蘇境。三百頭中阿塔是個共產黨徒，諾爾、哈瑪達拉二人則為急進份子。(註1)

新革命委員會組成後首先宣佈，發動這次政變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自

「外國與當地資本主義同盟」中「解放」蘇丹，恢復「蘇丹共產黨」所領導之工聯、學聯、青聯、婦聯四大團體之一切自由活動，着手組成「國家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其陣容為：蘇丹共產黨，阿拉伯社會主義組織，工人聯盟，學生聯盟，青年聯盟及婦女聯盟；解除對「蘇丹共產黨」之禁令，禁止努邁瑞政權所建立之組織，包括「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Arab Socialist Union—ASU)。

依照擬議中的「國家民主陣線」陣容，未來的蘇丹新政權之中，除了「阿拉伯社會主義組織」(Organization of Arab Socialists—OAS)之外，其餘全是共黨天下。就是「阿拉伯社會主義組織」亦與共黨有聯帶關係，因為這個組織的會員大都是馬克斯主義的信徒。

新革命委員會曾下令釋放四十九名政治犯，他們都是共產黨徒或左傾份子。同時勒令所有報紙停刊，聽候通知，但祇有一家擁護三軍報紙特准繼續發行；另一家週刊—The Nile Mirror也准許存在，這是一種赤色濃厚的刊物。

新任革命委員會主席諾爾七月二十日在倫敦招待記者說，他預知蘇丹的政變在醞釀中，但在此時發生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責責努邁瑞的專橫獨裁，早已經和民衆脫離，同時更試圖破壞與所有共黨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蘇俄。

阿拉伯世界，對於蘇丹政變保持緘默。而唯有伊拉克政府立即宣佈承認蘇丹新政權，並願全力支持與加強兩國之關係。同時更急忙的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蘇丹祝賀，但所乘飛機中途於沙烏地阿拉伯西海岸領空失事，代表團全部人員罹難。

蘇俄對蘇丹政變的情勢，表示審慎的樂觀。莫斯科一家權威國際事務雜誌稱：蘇俄表示支持蘇丹新政權，並攻訐被推翻的努邁瑞將軍(Gen. Jaafar Numeiri) 向西方接近，同時更讚揚政變新領袖們堅持一九六九年五

月蘇丹革命的理想。(註二)

但是，好景不常，情勢急遽轉變。由於蘇丹擁護努邁瑞的青年軍官激起「反政變」高潮；更由於蘇丹新革命委員會主席諾爾偕同委員哈瑪達拉於七月廿二日搭機由倫敦返國就任新職途中，突被利比亞政府強迫降落班加西國際機場，翌日即將兩首領押解蘇丹。努邁瑞總統隨即宣佈重掌政權，下令逮捕全國共產黨徒，並將叛軍首領阿塔及蘇丹共產黨總書記馬佐布（Abdul Khalek Mahjoub）等拿獲，交由軍事法庭處決。於是結束了這次短命的軍事叛變。

一 政變的內在因素

自從一九五六年蘇丹脫離英國獨立以來，曾經發生多次的變故。自一九五八年始，阿布德將軍（Lt-Gen. Ibrahim Abboud）奪取文人政權；一九六四年文人愛茲哈瑞（Ismail al-Azhari）取代阿布德政權；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文人馬高布（Mohammed Mahgoub）及馬赫地（Jaafar al-Mahdi）兩人先後分掌政權，愛茲哈瑞形同傀儡；一九六九年努邁瑞將軍奪取愛茲哈瑞及馬赫地政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諾爾及阿塔推翻努邁瑞政權，但經過三天後，努邁瑞旋即恢復政權。

這次政變主要的內在因素，不外奪權鬥爭與共黨紛爭兩方面：

在奪權鬥爭方面：努邁瑞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曾篡奪保守派的文人政權，當時建功最大的是一羣青年自由軍官，其中包括今日政變首領阿塔少校、諾爾中校及哈瑪達拉少校三人。努邁瑞為報答他們對於政變的功勞，曾經分別授予要職，除三人都被任命為蘇丹革命委員會委員外，另派阿塔兼任內閣副總理及畜牧部長，諾爾亦兼任內閣副總理及企劃部長，哈瑪達拉則兼任內政部長。

去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努邁瑞總統突然下令解除他們三人的所有職務，其所持的理由有二：

(一) 由於阿塔、諾爾、哈瑪達拉三人以前曾經參加共黨，（按：「蘇丹共產黨」已被列為「非法」組織）現彼等仍有勾結共黨，企圖顛覆努邁瑞政權的嫌疑。

(1) 由於彼三人極力反對初由埃及、利比亞、蘇丹三國所倡議之「阿拉伯聯邦」組織，當三國正式宣佈成立聯邦時，努邁瑞正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最後不得已始以蘇丹內部不安的理由，決定暫緩參加三國聯邦。

在共黨紛爭方面：共黨在蘇丹境內潛伏勢力甚大，而對智識青年誘惑力猶深。「蘇丹共產黨」成立已久，黨員多達數萬，為阿拉伯國家中最大之共黨組織。

在努邁瑞奪取政權之前，即曾與「蘇丹共產黨」領袖馬佐布密通聲氣，藉共黨勢力，始達其奪權的目的。等待成功之後，努邁瑞不但准許「蘇丹共產黨」為合法政黨，而且任命三名共黨份子為內閣閣員。

詎料努邁瑞奪取政權與共黨關係日益惡化，幾已瀕臨破裂的邊緣。努邁瑞為了防止共黨顛覆活動，曾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正式宣佈解散「蘇丹共產黨」，並大舉逮捕共黨份子，共黨首領馬佐布，遂二度被捕下獄。馬佐布距離這次政變前二十天越獄潛逃，又與政變首領阿塔祕密串通，遂演成七月十九日一場流血的叛變。

努邁瑞與共黨的基本衝突有二：

(1) 「蘇丹共產黨」認為蘇丹與阿拉伯國家聯合是不合時宜的，而且鑑於一九五八年埃及與敘利亞聯合的失敗，可作為今日的殷鑑。所以它堅決反對蘇丹參加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三國聯邦。

(1) 埃及過去也同樣有共黨的組織，但由于受國際共黨之命從事顛覆活動，曾被納瑟所解散，並將其納入「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之內。努邁瑞為了效法納瑟的做法，使蘇丹的政黨趨於一元化，故曾經決定組成類似埃及之單一政黨組織，其名稱亦為「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Arab Socialist Union-ASU）。蘇丹共黨唯恐將其併入同一組織，因而引起蘇丹共黨首領馬佐布的強烈反對。

二 政變的外在因素

「蘇丹共產黨」雖屬地方性共黨組織，但服從國際共黨之統一指揮。阿拉伯地區之共黨，包括伊拉克、敘利亞、約旦、蘇丹各地區，則統歸保加利亞共黨節制。

蘇俄對蘇丹提供大量軍事經濟援助，而努邁瑞竟公然排除共黨，并正式宣佈「蘇丹共產黨」為「非法」，自然引起蘇俄領袖階層之不滿。努邁瑞唯恐影響其對蘇俄的友好關係，曾於今（一九七一）年四月親往莫斯科加以解釋。

這次蘇丹的叛變，完全由「蘇丹共產黨」領袖馬佐布所策動，同時亦不無國際共黨的背景。茲舉兩個實例加以證明：

第一、根據外電報導，正當蘇丹政變進行之際，蘇俄駐開羅大使威納格拉道夫（Vladimir Vinogradov）曾經馳謁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促其支持正在蘇京喀土穆（Khartoum）進行中之共黨叛變行動，但被沙達特所嚴拒。

稍後，正在開羅訪問中的蘇聯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祕書卜諾馬瑞夫（Boris Ponomarev），也接着與沙達特會晤，再度要求埃及政府給予蘇丹共黨政變的一切支助，又遭到沙達特的拒絕。

據可靠消息，沙達特曾告訴卜諾馬瑞夫說，共產黨永遠不能為阿拉伯世界所接受。沙達特繼續向這位蘇俄官員表示，他將以果敢的決心向這個地區裏的共產黨搏鬥。（註三）

第二、據埃及半官方金字塔報（AL AHRAM）透露內幕消息，「蘇丹共產黨」總書記馬佐布於六月二十九日自獄中逃出後，即會潛伏在保加利亞駐喀土穆使館內，不斷與共產黨徒（包括政變首領阿塔少校）暗中集會，積極策動叛變。

保加利亞的協助阿拉伯共產黨從事策反行動，並非在蘇丹所初見，而早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策動。舉例來說，當一九六三年，伊拉克復興黨政權（Iraqi Baathist Regime）曾將伊拉克、保加利亞友好協會（Iraqi—Bulgari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關閉。其理由為，保加利亞曾經供應伊拉克共產黨武器，企圖推翻伊拉克政權。（註四）

當時由於伊拉克掀起整肅共黨運動，蘇俄曾於一九六三年採取制裁措施，削減其對伊拉克的軍事援助；同時對伊拉克的經濟發展援助計劃，也無形中陷於停頓狀態。

另一個外在因素是，阿拉伯國家的自身——伊拉克，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伊拉克是唯一搶先承認這個短命的赤色政權，也是捲入這次政變嫌疑最

大的一國。

策動蘇丹政變之一的伊拉克首腦，據說是伊拉克的「強人」塔克瑞提將軍（Gen. Sidam Hussein Takriti），他是伊拉克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也是伊拉克總統巴克爾將軍最親信的人物。

塔克瑞提策動政變的動機，在使伊拉克復興黨黨員獲機參加蘇丹的政治活動，藉以達成復興黨的「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目的。

塔克瑞提曾經與反對努邁瑞派官員密取聯絡，並指定一名蘇丹籍之巴格達復興黨員索羅門（Mohammed Salman）來執行這項聯絡任務。

索羅門曾於七月廿二日衝命飛往蘇京喀土穆向蘇丹政變領袖致賀，不意飛機中途於沙烏地阿拉伯上空失事，索羅門隨即墜機斃命。適正值蘇丹總統努邁瑞宣佈恢復職權的同日。

伊拉克遭此重創後，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巴克爾將軍（Gen. Bakr）曾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蘇丹政變事件，當時若干委員感到驚異，一致譴責塔克瑞提事前並未提出商討，而致弄成大錯，使伊拉克受辱於整個阿拉伯世界。

在衆議指責下，巴克爾不得已始將塔克瑞提拘禁，成為代罪的羔羊了。（註五）

四 反政變的成功

努邁瑞總統於七月二十二日重掌政權之後，立即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下令搜捕所有參與政變份子及共產黨徒，為數約一千餘人。

政變軍事首領阿塔少校、諾爾中校、哈瑪達拉少校等，均以叛國罪名被處決。而情節重大的三名共黨首領均被處以絞刑。這三名是：馬佐布（蘇丹共產黨總書記）；沙菲·愛麥德（Al Shafei Ahmed Sheikh）（貿易聯盟主席）；尤素福（Joseph Karnak）（蘇丹南方事務部長）。

這次努邁瑞反政變的成功，得力於兩個因素，一是國內的，一是國外的。

在國內方面：由於原來效忠努邁瑞的部隊，於政變後曾被短時間解除武裝，故不得不偽裝順從叛軍的命令；而於重新獲得武器後，阿巴斯上尉策動反政變的行動，裝甲部隊亦迅速由郊區開入喀土穆，當即包圍總統府、叛軍總部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戰略據點，經九小時之激戰，阿塔少校卒被就擒，叛軍大勢已去，政變即告敉平。

在國外方面，完全有賴於埃及、利比亞的支援。兩國政府於蘇丹政變之後，即曾決定採取緊急行動，以圖恢復努邁瑞政權。首先於七月二十一日適有蘇丹新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之諾爾中校，偕同另一委員哈瑪達拉於搭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飛機返同喀土穆途中，突被利比亞空軍攔截迫降，旋即被捕；翌日，即被利比亞當局押送蘇丹法辦。此對提高民心士氣收效頗大。

再則蘇丹原駐蘇彝士運河區之一營部隊約有七百名，由蘇丹國防部長阿拔斯率領，在埃及政府協助下，以運輸機多架將蘇丹全部軍隊載運至距喀土穆二十五公里之瓦地白那（Wadi Beedna）降落，即向喀土穆方向推進，蘇丹政府軍獲得此批生力軍救援後，始能擊敗叛軍，解除三天來的危急局勢。（註六）

五 各方的反應

阿拉伯世界的輿論，對於努邁瑞重掌政權所採的措施，反應不一，右翼報紙一致表示讚揚，而左翼報紙則紛紛加以譴責，更認為處決共黨首領是「血腥」的恐怖行為。

伊拉克復興黨政權，於蘇丹政變的當天即宣佈承認新政權。一俟努邁瑞恢復政權後，旋於七月二十四日宣佈與伊拉克斷絕邦交，並指責巴格達政權有意干預蘇丹內政。伊拉克亦採取相同的措施，但否認蘇丹對其干預內政的指控。

埃及在反政變行動中，一直給予努邁瑞極大的助力，最明顯地是派遣飛機護送蘇丹部隊對叛軍作戰，解除了千鈞一髮的危局。更難得的是，埃及總統沙達特在危難中，指派副總統沙非飛往喀土穆與努邁瑞共商安定大計。

利比亞政府且曾攔截搭載政變領袖之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客機，結果引起英國議會的憤懣，要求埃及政府對利比亞採取報復手段，嗣後雖經英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利政府將扣留兩名蘇丹領袖隨原機攜返倫敦，但嚴遭拒絕并將二首領送交蘇丹政府法辦。努邁瑞控制局勢之後，立於當（二十二日）晚以長途電話向埃及、利兩國領袖表示謝意。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很快地致電努邁瑞申賀。在電文中說：「上帝曾加福於你，使蘇丹能從『叛教的國際共黨』中拯救出來。我們同深感謝上帝

，並祝你在反共大業上勝利，上帝必能賜予更大的助力。」（註七）

蘇俄方面，當反政變進行之中，蘇俄在蘇丹的軍事及技術顧問一千八百餘人，曾經受到「保護性」的監視，不准離開他們原來的住所，以防止其協助叛軍，或被平民殺害的情事發生。

政變敉平之後，由於努邁瑞將軍處決蘇丹勞工領袖沙菲·愛麥德（Al Shafei Ahmed Sheikh），曾引起蘇俄總工會的激憤，並提出強烈的抗議，指控蘇丹當局的謀殺野蠻行爲。但蘇丹政府拒絕了此項指控，認為這純粹是內政問題，不容外人加以干預。

蘇丹政府由於俄共不斷的攻擊，曾於七月卅日向蘇俄提出最後通牒，限二十四小時內停止攻擊蘇丹政府，但被蘇俄所嚴拒。於是，努邁瑞於八月一日下令召回蘇丹駐蘇俄及保加利亞大使，並令蘇俄駐蘇丹使館參事歐爾拉夫（Mikhail Orlov）及保加利亞駐蘇丹大使蔡毛夫（Stoyan Zaimov）離境。

六 蘇丹對外關係

蘇丹幅員廣大，人口約計一千四百萬，為非洲最大的國家。更因位於紅海西岸，實構成戰略上之重要價值。

蘇俄方面：蘇俄在北非的勢力，以埃及為第一，其次是蘇丹。蘇丹的軍事幾乎完全依賴蘇俄的援助，蘇俄現駐蘇丹軍事顧問人員約計五百名，另有薩姆二式飛彈基地之設立，一九七〇年俄人曾在紅海岸之「蘇丹港」開闢一個海軍基地，以便蘇彝士運河將來通航時俄艦得順利駛往印度洋，同時亦可利用蘇丹作為蘇俄向非洲心臟地區滲透的橋頭堡。

蘇丹的軍事裝備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由蘇俄供應，其餘是由東歐共產國家供給，其價款以棉花償付。

蘇丹農業產品以棉花為主，而所產長纖維棉花（long-staple cotton）可

蘇丹出口貨物以棉花佔第一。一九七一—七二年出口貿易額總計一、一〇〇、〇〇〇包，其中蘇俄購買三〇〇、〇〇〇包（價值蘇丹鎊一千五百萬），毛共二四〇、〇〇〇包，東歐共黨國家一〇〇、〇〇〇包。這就是說

蘇丹，一年所售與社會主義世界的棉花佔出口總額半數有餘。剩餘的銷售印度約計三五〇、〇〇〇包。（註八）（按：一蘇鎊等於二·八七美元）

蘇丹五年經濟計劃已自一九七〇年開始實施，此項計劃是由二十三位蘇俄專家草擬的，預計自一九六九—七〇年全國生產量總值五億六千五百萬蘇丹鎊，相對的增加到八億三千三百萬蘇丹鎊，換言之，比較過去五年間之每年平均生產百分之四·七，昇至百分之八·一。社會主義國家在五年計劃中投資額為九千五百萬蘇丹鎊（註九）。

蘇俄對蘇丹之紅海丘陵地區（Red Sea Hills area）所貯銅礦等地下資源，特別感覺興趣，正在協助開採中。

蘇俄亦提供蘇丹農業的技術援助，並計劃加強灌溉工程，預計在五年計劃中，增加長纖維棉花約在兩倍以上。

保加利亞人替蘇丹建設模範農場，並協助其他工作。（註十）

上面所舉的例證，不過是蘇俄集團國家在蘇丹廣泛活動的一小部份而已。

毛共方面，毛共年來亦爭向蘇丹滲透，努邁瑞曾於一九七〇年八月訪問大陸匪區，毛共同意以蘇幣一千三百五十萬鎊借與蘇丹，並將協助建築一條在蘇丹東部高路，把距離一百三十哩地區（麥丹尼與吉達里夫——Medani With Gedaref）連貫起來。最近毛共又利用蘇丹反俄情緒，對蘇丹加以籠絡。蘇丹總統努邁瑞曾於八月四日接見偽使翁沛文談話，努邁瑞並以親筆函交其轉致毛匪澤東及周匪恩來，感謝毛共在蘇丹政變中所持的態度。蘇丹政府已派國防部長阿拔斯赴匪區訪問，接洽經濟援助與技術合作，據傳毛共已允提供四千五百萬美元之經濟援助，預料蘇丹與毛共關係將更趨接近。

歐美方面，在蘇丹五年經濟計劃中，西歐國家提供一項約值二千五百萬蘇鎊之援助。近來蘇丹確實有意獲得西方國家之援助，重行調整對東西方間的國際平衡關係。

美國與蘇丹關係一直陷于中斷之中。英國、西德與蘇丹關係，由於一九七〇年五月蘇丹實行國有政策，所有其國內之外國銀行及大型企業等均被收回國營。其中有關外國的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進出口公司，大多屬於英國

人所有，而蘇丹政府所應償還之價款估值二百萬至三百萬蘇鎊，迄今尚未償付。（註十二）

努邁瑞政權恢復之後，由於對蘇俄關係的惡化，曾表示願意考慮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但須視美國在中東問題中對以色列所持立場為定。

阿拉伯方面，阿拉伯世界中，除了伊拉克別有用心外，一般對蘇丹關係尚稱良好，即阿拉伯保守集團領導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亦特別支持努邁瑞的反共政權。

埃及、利三國組成聯邦，由於蘇丹共黨問題未獲解決，延誤了蘇丹的參加。努邁瑞曾於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宣佈，蘇丹決定明年一月參加阿拉伯聯邦。今後蘇丹與三國的關係，必能日趨密切，對中東前途之影響至大。

七 阿拉伯世界與俄共關係

這次努邁瑞能從共黨手裏重獲政權，不僅使阿拉伯人歡欣鼓舞，同時也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其主要的理由，或者由於蘇丹結局對蘇俄與阿拉伯關係具有深厚含義，特別對於阿拉伯世界中共黨運動的未來命運。

在過去十二年當中，共黨在阿拉伯世界曾經遭受一系列的挫折，而蘇丹赤色政變的失敗，不過是其中之一部份。一九五九年，蘇俄與埃及關係突趨緊張，當時埃及總統納瑟曾經為了埃及與伊拉克兩國的反共運動向蘇俄領袖們挑戰。該項運動，雖然不像這次蘇丹流血政變的慘烈，但許多的埃及共產黨徒都被拘禁起來。納瑟深知必須依賴蘇俄的軍經援助（特別是正在接受建設計阿斯萬水壩之援助），但決不容共黨勢力與其國家民族為敵。

到了一九六四年，兩國關係稍漸和緩，蘇俄前總理黑魯雪夫於是年訪問開羅，與納瑟會談改善兩國關係，納瑟仍堅持不准任何政黨在埃及活動，而祇許唯一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政黨的存在。

同時納瑟亦向黑魯雪夫提出保證，埃及將尋求一嚴格的社會主義政策，並與社會主義世界站在一條陣線。於是俄才下令「埃及共產黨」自行解散，併入「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之中。（註十三）

蘇丹七月政變，「蘇丹共產黨」的慘敗是過去十年來所僅見的。已被絞死的蘇丹共黨首領馬佐布（Mahjoub）曾經抨擊「埃及共產黨」自願解散是一

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阿拉伯世界還沒有一個共黨組織自願解散的。其實，目前除了黎巴嫩一國之外，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共黨一律是「非法」組織。

伊拉克的共黨，曾於一九六三年遭受復興黨的迫害。當時伊拉克強人卡塞姆（Abdel Karim Kassem）一度利用共黨的助力，始於一九五八年篡奪費塞爾王權，但不久即對共黨加以壓制。當卡塞姆政權於一九六三年二月被復興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及納瑟主義者聯合勢力推翻時，曾經發生流血的悲劇。伊拉克共黨在這場流血戰鬥中犧牲最慘。

蘇俄爲了抗議伊拉克復興黨對共黨的暴行，一度曾中止其對伊拉克的軍經援助。

伊拉克與莫斯科間的關係，到了後來的阿瑞福（Abdel Salam Aref）及拉曼（Abdel Rahman）昆仲執政時期，已稍見改善，直到巴克爾復興黨政權時期，始允與當地共黨合作，但後來又遭受復興黨的迫害，導致蘇俄對伊拉克政權的不滿。孰料伊拉克巴克爾政權竟支持蘇丹赤色政變，而不惜被棄於阿拉伯世界。

敘利亞阿塞德政權雖禁止共黨活動，但仿效埃及政黨組織，組成一元化政黨——民族進步陣線（National Progressive Front），將所有政黨納入此一陣線（包括共產黨），統歸復興黨負責領導。

阿塞德內閣中儘管有兩名共黨閣員，可是，他們並非以敘利亞共黨資格參加，而是以私人身份入閣。

阿拉伯國家的共黨所遭受的挫折，有如蘇俄在阿拉伯世界同樣的遭遇。

蘇俄最嚴重的一次挫折是在中東「六日戰」以後，當時阿拉伯人紛紛指責蘇俄未能立即應援，坐視阿拉伯人被以色列擊敗，結果失掉一大片的土地。

如今基於軍事和經濟上的需要，雖然少數阿拉伯國家與蘇俄關係有所改進，可是祇建立在政府的水平上面。至蘇俄與阿拉伯人民大眾間的關係，一直未能恢復其舊有聲勢。

今年五月埃及發生一次政潮，沙達特總統整肅他的政敵們，其中包括副總統沙布瑞，他被認爲是「莫斯科最親近的人物」。

正當埃及、俄兩國關係趨於緊張之際，蘇俄主席包戈尼隨即率領一個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前往開羅，簽訂一項十五年友好合作條約。蘇俄的目的在於防範埃及可能改變其對俄政策。

八 結論

從上述蘇丹政變及俄共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看來，我們可以獲致下面幾點結論：

第一、蘇丹共產黨經過這次的失敗，今後將轉入地下活動。然無論其組織如何嚴密，人數如何衆多，但在努邁瑞決心消滅共黨下，更有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支持，共黨永久失敗的命運是注定的。

第二、俄共曾經對這次蘇丹赤色政變作有力的支持，的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爲蘇俄對於努邁瑞採取敵對的行動，已經引起阿拉伯世界輿論界的抨擊。今後與蘇俄有密切關係的阿拉伯國家必將存有高度的戒心。

第三、基於理論上的極大衝突，一個無神論的共產邪說，是根本無法與有神論的伊斯蘭教相并存。即或有少數阿拉伯國家的共黨暗中活動，亦無法與其他左翼政黨——特別是納瑟主義相抗。因此，共產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終將被埋葬無疑。

第四、俄共鑑於過去和現在失敗的教訓，可能重行修正其對阿拉伯共黨的策略，其唯一的可行方法，使阿拉伯共黨接受當地政府命令，歸併類似埃及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組織，若此則可保持共黨自身的安全，亦不致影響蘇俄在阿拉伯世界之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利益。

註一、*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July 31, 1971. A Dialogue With Abdel Khalek Mahjoub.

註二、*The Guardian*, London, July 22, 1971, by Peter Harvey

註三、Cairo, Aug. 10, 1971 (AP), by Aly Mahmoud.

註四、*The Arab World Weekly* July 31, 1971. (P. 9)

註五、Beirut, Aug. 19, 1971 (UPI)

註六、Khartoum, Sudan, July 29, 1971, (NYT)

註七、Tripoli Libya, July, 27, 1971 (Agencies)

註八、*New Middle East Monthly*, London, July 1971, P. 27

註九、*Ibid* Page 28

註十、*Ibid*

註十一、*Ibid*

註十二、*Ibid*